

人民作為一種修辭？

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中的民主與身分認同

People as a Rhetorical Term:

Democracy and Identity in Hong Kong's Anti-ELAB Movement

彭麗君*

Pang Laikwan

「人民」或許是現代政治術語中一個最空洞卻又最具力量的詞彙。儘管政治家們會利用它來撈所謂的政治本錢，或是為自己的判斷錯誤做辯護，但人民這個概念也是所有現代政治體制之合法性的基礎和來源。實際上，民主最基本的含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任何的民主設想和機構都不可能迴避人民這個概念。但是正如我們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廣泛觀察到的情況一樣，這個詞彙常常也和不同程度的仇外情緒聯繫在一起，即在團結的名義下對外來者表示拒絕和仇恨。作為一次民主運動，2019年香港的反逃犯條例示威運動受到了「香港人」這一詞彙的巨大推動。隨著運動的展開，一句最流行的口號「香港人，加油！」逐漸變成了「香港人，反抗！」和「香港人，報仇！」，這展示了示威者對不受節制的警方暴力及其幕後的北京政權的憤怒。但是與這個詞彙相關聯的武力化，同樣也可能令一些人

投稿日期：2020年2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6月30日。

* 彭麗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學術著作包括：*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0), *The Art of Cloning: Creative Production Dur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Verso, 2017), *Creativity and Its Discontents: China's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fens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The Distorting Mirror: Visual Modern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等。

聯絡方式：lkpang@cuhk.edu.hk。

感到不安。所以，我們有必要瞭解「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的意義。

一方面，這座城市的內部撕裂，讓當中的市民生活得很痛苦。在這座全球都市中，外部的對立不可避免地糾纏著內部的矛盾，更何況它從來都沒有形成一個團結的社會，城市內部本來就已經有強烈分化，反送中運動讓協商和解變成海市蜃樓。在這次運動中，「香港人」這個詞主要代表了兩個層面的對立。首先，這次運動很顯然來自港陸的矛盾，個人也因此被劃分標籤，對於這次運動最流行的一個批評——尤其是在大陸及其離散群體中——就是它對大陸人的歧視，中港矛盾發生在香港之內，也發生在香港以外。其次，對立也存在於示威群體和反示威者之間。我們通常稱之為「黃藍對立」。很多「藍絲」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她們不一定是政權所標籤的「愛國愛港」人士，未必完全擁抱中國政權，但她們可能討厭社會不安，也可能不認同抗爭者的手法和思維。當然黃藍也有深淺之分，香港社會也還有不少沒有明顯政治主張的人，香港人依然是一個無法被同化的社群。另一方面，在這種社會異常割裂的狀態下，這次運動卻完全沒有領袖帶領，整體的節奏和各種抗爭細節完全由民眾主導，在多元地演變下發展。運動得以持續，很大程度依賴參與者互相支持，示威者的促成也體現了運動中一個最重要的口號：不割席。示威者的勇氣堅毅和運動的持久獲得了廣泛的國際同情。

和發生在其它時空的政治事件一樣，敵友關係是這次運動最重要的動力（Schmitt 2007），運動中的「香港人」對立於「中國人」，也對立於香港人中的「藍絲」。但如此繃緊的對立關係下，城市內部的多元和混雜的狀態沒有讓香港人完全被政治二元本質化，而以上的兩種對立也有很多互換空間，例如，很多香港示威者也視內地支持者為戰友。也因為沒有領導者，跨主體的互相尊重和合作變得更重要。儘管香港社會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對立和仇恨，這次運動同時也微妙地重塑了這座城市的社會形態。我們當然沒有看到社會融合修好，所有人都互相擁抱接納——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充滿分化和矛盾的地方。但我確實察覺到一些既有的社會層級因為這個運動而被鬆綁。

除了為這個運動提供一個切面外，我也希望這篇文章可以帶出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和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之間的張力。一個明顯例子，就是之前有香港本地的女性主義者們激烈地辯論著，這次運動究竟在本質上是否父權（何式凝2019；蔡玉萍2019），還有一些關於示威者歧視內地人的討論（端傳媒評論組2020）。我很感謝相關學者提出的問題，歧視是所有社會都有必要反省的。但在如此一個既深又廣的社會運動中，再加上當中極度的情緒化，基本上我們都能夠找到證據支持自己的立場。只糾纏在一時一事的對錯爭論中，不一定能帶動討論繼續前行，反而很容易跌進政權為我們設下的內鬥陷阱中。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首先把本質化的身分對立作為討論前設，無論是「男—女」，或是「中—港」，我們的結論也很難超出這種二元思維。我更有興趣的是，通過參與一個社會運動，我們能否超越血緣或社會的同質性，為群體內外動態的多樣性和交叉性帶出新的可能呢（Dean 1996: 36; Fraser and Honneth 2003: 113-124）？毫無疑問，性別和文化歧視存在於某些示威者當中。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本質化的身分正在被新的政治動力驅散，這更根本地挑戰了現存的意識形態統治。相比於社會和生理的身分，政治參與正在成為構建「香港人」更加重要的因素，這為推翻現存社會劃分打開了空間。也就是說，在思考這個政治運動作為一個身分認同運動的同時，我們有需要把身分中的政治部分和社會部分區分開來，以更積極了解身分中可變與不變的張力。我們也應該更細緻觀察當中的敵友關係的操作，讓我們探討如何可以讓「友」的邏輯更豐富發展，而不會被「敵」的仇恨支配和壓倒。

政治與情感聯結

香港2019年的社會動盪始於同年2月提出的一項引渡法案，其目的是將逃犯引渡至與香港無正式引渡條例的地方進行司法審判。由於這些地方包括了中國大陸，這個法案引發了香港及海外大量的批評和焦慮。許多人相信這個方案的提出是為了方便中央政府將自己想要的任何人從香港引渡至

大陸。儘管從3月起就已經有相關的示威活動，但是當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堅持要通過該法案時，大規模的反政府運動在2019年6月爆發了。數百萬的市民走上街頭，平民和警察之間的暴力衝突也隨之逐漸升級。在北京的支持下，香港政府拒絕妥協和協商，矛盾也因此發酵和爆發。

示威者一般將自己視為兩個派別中的一個：「勇武派」或「和理非」。儘管那些忙著製作文宣和提供各種援助以支持示威行動的「和理非」佔了大多數，但是，少部分擲磚和燃燒彈的激進示威者，沒有因為警方的激烈逮捕而減少，反而更多本來和平的示威者被運動激發，走上前線。這次運動的群眾支持是廣泛的：多次民調表明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一直與示威者站在同一陣線反對政府和警察，這也進一步體現在11月區議會選舉中大部分泛民派候選人的勝利上。

在一本剛出版的書裏，我探討了2014年香港的佔領運動，並將其視為「人民」概念的一次體現，我稱之為「民現」（Pang 2020）。在這場佔領運動中，個人離開自身私人居所，走上街頭參與政治行動，通過佔領公共空間並形成活躍的社群。尤其是運動初期，自主的示威者們參與了公共討論和遊說，以建立一種非等級制的關係並定義公共利益。她們是平等的，也有很強的主體性。理想地說，初期的佔領區可說是某程度的政治自由之地，在那裡示威者們可以一同實踐她們的民主和未來。但是這些試驗並未被給予繼續發展的機會，「傘運」被視為一場失敗的運動，讓參與者感到非常困頓，這也使得香港人的政治挫敗感繼續發酵。

五年後的反送中運動似乎催生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示威社群。鑒於雨傘運動的教訓，示威者將李小龍武術哲學中的“be water”視為自己的格言。她們並不長久地佔領任何地方，而是採用游擊的策略來規避指認和圍捕。同時，為了避免自己的面部和身體特徵被識別，大部分的示威者都穿上了面罩和黑色服裝。越來越多的示威者採取了所謂的“black bloc”服飾：防毒面具、袖套、腰包、黑色T恤、黑色長褲以及黑色運動衛衣。她們作為一個無法被識別的群體出現在街頭，其難以捉摸和頑強的生命力對於某些人而

言是如此具有威脅性，以至於被警察蔑稱為「甲由」¹。實際上，最大規模的一次逮捕發生在11月下旬的香港理工大學，正是由於示威者的聚集才使得警察可以指認和圍捕她們。這間接地證明了“be water”和無領導策略的有效性。

但我並不認為香港的示威群眾從2014年的公眾退化成了2019年的暴徒，或者人民從出現變成消失。儘管“be water”的策略確實規避了差異，使得每個人看起來好像一模一樣，但是這種外表上的同化並不意味著個體性的缺失。大部分的前線示威者是自主的，她們在選擇自己的位置之前都會仔細地判斷。感謝許多本地和海外媒體的採訪，以及示威者自行組織的新聞發布會，我們能夠聽到這些匿名的示威者的個人聲音展現在公眾面前。正是她們真誠的控訴，有時候甚至是遺書，引發了世界上很多人的支持。通過2014和2019年的政治經驗，很多香港人在「個體性」與「群體性」之間取得了艱難的平衡，慢慢形成了一種新的香港運動參與者的政治身分。

在承認這個新香港人身分中強烈敵我關係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它包容的特質，因為這次行動顯然歡迎任何支持它的人，不管她們階級、教育、年齡、性別和種族的差異。由於這次運動，能夠暫時地錨定眾多事件懸而未決的含義，以及眾多個體不成體系的意見，來表達某種共同的政治話語，我們可以將它稱為霸權（hegemony）的一次強有力的表現。霸權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它的非永久性以及非本質化，霸權不是被授予的，也不是繼承的，而必須要每一次努力經營。霸權也是由眾多矛盾和抗爭組成，霸權的連接能夠讓任何一個抗爭成為另一個本來不相干的抗爭的支持和推手（Laclau and Mouffe 1985: 170-171）。我在這次運動中，觀察到現存的社會邊界如何被消解和重組，以形成新的政治霸權。

許多香港人都震驚於前線擲磚和縱火的年輕女性的出現。根據香港民間「反修例運動研究數據庫」相關的數據，從2019年6月9日到2020年3月31日因反送中示威被捕的7992人中，有2013人為女性，占據了被逮捕人數的

1 即廣東話中的蟑螂。

25%。²作為參考，根據英國政府的數據，2011年倫敦騷動中10%的被捕者是女性。³如果說在國際間，憤怒的騷動者的主流形象是年輕男子，那麼，本地和全球的媒體卻熱衷於在香港捕捉女性示威者的形象，尤其是當她們被逮捕後面罩被警察除下的時刻。這些年輕女性堅毅的面龐或許是具有奇觀性的，但是這些圖片也強有力地破除了有關女性特質的一些刻板印象。在許多採訪當中，這些女性示威者也公開展示了她們如何樂意置身前線，努力依據自身的能力來幫助行動，並且要求得到男性示威者的認可。正是在這個戰場上，許多女性第一次以勇氣和尊嚴直面社會和政治的陳規。

雖然我們無法獲得任何準確的數據，這次運動中也有很多同志人群。我們可以在有關的社交媒體平台上看到同志們如何在前線戰鬥，如何協調政治參與和性別身分，以及示威者之間產生的愛情故事。當中的某些人成為了運動中的著名人物，例如岑子傑。岑子傑是民間人權陣線的召集者，在這次運動中組織了多次遊行和集會，同時他也是LGBT權益組織「香港彩虹」的秘書。作為反政府集會的發言人，也是這次運動中最具象徵性的公眾人物之一，岑子傑在8月和10月的兩次被襲引發了巨大的社會關注，他也在最近的區議會選舉中贏得了一個席位。但他並不是行動的領導者。與此相反，他主要將自己視為一個召集者和秘書，負責實踐示威人群的普遍意願。對於這種新型的無領導社會運動而言，這一位置是極其重要的，它既保證了所有示威者的平等，又承擔了組織的重要任務。

有趣的是，岑子傑10月份的被襲案中，實際上突出了香港兩類少數群體身分：一位男同志被一群南亞裔人士攻擊。在主流在香港社會中，南亞社群一直都是被邊緣化的，其中南亞男性成員往往被污名化為麻煩製造者甚至是匪徒。在這次攻擊之後，有關伊斯蘭社群將會被報復的謠言立刻興起，因此伊斯蘭社群變得高度焦慮。但是岑子傑很快就發表聲明譴責任何

2 參考：反修例運動研究數據庫。2020。〈被捕人士數目，按性別和年齡群組劃分（09-06-2019－31-03-2020）〉。Retrieved from: <https://antiabdata.jmsc.hku.hk/zh/%e7%b5%b1%e8%a8%88%e8%b3%87%e6%96%99/> on July 3, 2020.

3 參考：Topping, Alexandra, Rebekah Diski and Helen Clifton. 2011/12/09. "The Women Who Riot,"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11/dec/09/women-who-rioted-english-riots/> on July 3, 2020.

攻擊伊斯蘭社群的提議，同時社交媒體上很快出現了許多帖子，將南亞社群讚頌為此次示威行動忠實的同志。在岑子傑受襲數天後的示威中，九龍清真寺真的受到了攻擊，但並非由示威者所為。相反，是警察的水炮車衝擊了清真寺。為了展現團結，一群本地志願者很快出現，並清理了清真寺鐵門上的藍色腐蝕水。她們互相提醒，穆斯林社群是香港社會的一個重要和合法部分。一次暴動襲擊以及警方的一次不當行為使得少數族裔重新與主流社群連結起來，而許多在香港的人，不論她們的種族身分，都樂見社會的融合。

這次運動同樣被許多左翼人士批評缺乏階級意識，情況確實如此。正是民主陣營和支持北京的陣營之間的對立構成了此次運動的主要矛盾，而兩邊陣營都是由跨社會階層的支持者組成。儘管我將這次運動稱為一次霸權運動，但我並不認為它是民粹主義，因為民粹主義主要由平民和精英之間的分化來維繫的。然而這次反政府運動很明顯受到很多精英階層的支持，從律師到醫護人員，甚至商人等。重要的是，絕大部分的示威者對政權的憤怒，並不是由經濟利益驅動的。反之，政治的抗爭正誘發新的經濟實踐，一個新的「黃色經濟圈」正在形成，目的是為了構建一個另類的自下而上的經濟體，以此規避「藍色商人」和「紅色資本」在香港的經濟壟斷。很多人正努力開發新的社交平台，為運動支持者配對消費者和服務商、雇員和雇主，還有新的融資渠道和加密貨幣也正在試驗中。我們不知道這個經濟結構將會如何發展，但是它的形成，表明了基於共同的社會參與而形成的新的經濟結構，是有可能的。

朝向一種新的身分認同

以上是一幅非常不全面的社會剖析，我不想以偏概全，大家可能可以找到很多反證。我也不想浪漫化這次運動，它所製造的破壞和痛苦對於所有人而言都是顯見的——當所謂的文明社會的面具被撕開之後，許多人僅僅依照自己強烈的情緒行動。但我想指出，在強烈的憤怒和仇恨之下同樣

有一種新的聯結正在形成。由於這次運動曠日持久，並維持著高強度的抗爭，示威者們已經對彼此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這種新的團結打破了現存的身分邊界，並且激烈地打開並擴散了「香港人」的含義。衆多國際的示威研究已經表明，當代示威者對於社會運動的投入，往往與她們的政治態度和情緒投入，形成正比（Giugni and Grasso 2019: 159）。由於這次運動已經持續了如此之久，並且影響社會如此之深，示威者彼此之間在認知和情感上產生的信任感是極其濃厚的。也就是說，這種通過政治參與的社群關係，同時也是文化的、社會的。這種示威身分可以消解許多現存的文化或社會歧視，而共同的政治參與也將那些曾經彼此脫離的人群有效地連結在一起。

「手足」這詞彙越來越多地使用也解釋了這一點。我們都知道，「手足」這個詞一般被用來比喻家庭和社會的兄弟情誼。但在這次運動中，這一詞彙被用來描述所有親身參與示威的人，無論男或女、本地人或非本地人：她們可能是人鏈中的一部分，貼過連儂牆（Lennon Wall），或曾共同擁有被警察攻擊、遭受胡椒噴霧和催淚彈的痛苦經驗，也有被捕的、跟朋友和家庭成員發生政治衝突而身心俱疲的……這些生理或情緒上的肉身經驗定義了這個示威社群，使得政治經驗在個體和同伴身上留下了長久的印記，使他們成為莫逆之交。如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97）提醒我們，理想的友誼充滿強烈的愛，不是被愛，而是主動地無條件地去愛，從而超越自己，但這種大愛也一定是幻象，相信的人也必然被背叛。了解這種矛盾，並不等於我們不擁抱友誼，反而我們更應該在這樣的虛實中尋找自己，體驗人性。這是政治一個很重要課題。

實際上，這次運動也生成一種並不需要在文化或者生理上與香港相關的所謂「精神香港人」。儘管在中國大陸，到處都是龐大的審查機器和泛起的愛國主義，仍有一小部分大陸人在政治上同情甚至認同香港。這在那些張貼有關大陸人支持香港示威行動信息的社交媒體平台上可以明顯看到。⁴近日也有不少的各地的年輕人表達對香港抗爭的認同，從「奶茶聯

4 譬如臉書上的「內地生撐香港」或Twitter的「中流青年」。

盟」到日本漫畫《漫画香港デモ 激動!200日》。大家對香港抗爭的認同明顯也是受到敵友的邏輯所推動，但這種跨地區的聯盟也是一種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此處的「精神香港人」僅僅是一個比喻、或表演，它指的並非是一群由血緣或歷史界定的人群，而是抗爭和政治參與的象徵。有鑑於此，我樂觀地相信，本地人和大陸人之間原本的社會斷裂有可能通過政治聯結得到緩解和重建，因為這次運動主要是由政治行動和判斷所界定的，而非生理身分。將政治身分和社會血緣身分緊緊交疊的，是中國的國家宣傳機器。這次大規模和大範圍的政治動盪或許給予了香港社會一個機會來重繪它的社會劃分。

一位臺灣女性行動者黃燕茹在她的臉書主頁上描述了自己在香港參與一次群眾示威行動，並與街頭的香港示威者發展出友情的經歷。我們或許無法得知這個自述的虛構程度，但是即使將其解讀為一篇文學作品，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次運動所傳達的跨本土的吸引力和解放感。黃燕茹在8月28日的臉書上描述了示威者在荃灣與警方發生暴力衝突之後，她同一些本地示威者逃命的經歷。⁵當她最終到達一條繁華的街道上並且感覺安全之後，黃燕茹發現自己剛才遇見的一名香港女性示威者仍然在她身邊。她們開始交談，同時她也被鄰里之間對示威者的支持感動和迷住。在這個回憶中，我們看到了臺灣和本地示威者之間產生的某種浪漫的姐妹情誼，並迴盪著一種高度的自由和移動性。與此同時，這種女性情誼和自主性也被嵌入到了一個社群當中，並且得到了後者的支持。不管它是虛構的還是非虛構的，香港內還是香港外的，正是這種政治社群，界定了新的「香港人」。

這也印證了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政治理論。阿倫特拒絕將生理和社會身分視為有效範疇，不是因為她不尊重這些身分，而是她覺得生理身分是天賦的，基本不在自己的選擇範圍內，而社會身分主要基於個人的社會關係和自身喜好，兩者都不能成為我們政治行動的依據。我們不能

5 該臉書內容同時載於：黃燕茹。2019/08/29。「一個台女：作為台灣衝組，楊屋道一役竟然開始不理性地羨慕香港勇武派」。立場新聞。Retrieved from: <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一個台女-作為台灣衝組-楊屋道一役竟然開始不理性地羨慕香港勇武派/> on July 3, 2020.

因為自己屬於某種生理或社會群族，而影響自己的政治思考。相反，她強調政治參與才是界定個體獨特性的唯一方式。她並不相信任何建立於群體之自戀上的身分政治是個體的自然延伸，相反，她認為人最強的能力，正在於製造各種新的開端，重新連接，可以打破歷史機械式的前進，帶來改變。我覺得香港的這次社會動盪表明了阿倫特「行動生命」（*vita activa*）概念的智慧，她說：「行動意味著主動、開始、並將某件事付諸實行。」（Arendt 1998: 177）行動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社會的自由生命所在。當社會被推向行動，香港人該用自己的智慧來決定如何重建一個政治自由和平等的世界，並尊重每一位成員的獨特和自主。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Pang, Laikwan (彭麗君) 著, 李祖喬 (Joseph Li) 譯。2020。《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Minxian: zai houzhhanlin shidai sikao chengshi minzu* [*Appearing Demos: Thinking City Democracy in Post-Occupy Period*]。香港 (Hong Kong)：手民出版社 (Typesetter)。
- 何式凝 (Ho Petula)。2019/11/28。〈深度評論：香港女權主義者的「時代革命」〉“Shendu pinglun: Xianggang nyuquan zhuyizhe de shidaigeming” [*In-depth Criticism: The Revolution of Hong Kong’s Feminists*]。蘋果新聞 (臺灣) *Pingguo xinwen (Taiwan)* [*Apple Daily (Taiwan)*]。Retrieved from: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191128/UXNH2NNBRT5ASQTHVW4IN3HF6U/> on July 3, 2020.
- 蔡玉萍 (Choi Susanne)。2019/12/02。〈香港反修例運動很父權？回應何式凝教授〉“Xianggang fanxiuli yundong hen fuquan? Huiying heshing jiaoshou” (Hong Kong’s Anti-ELAB Movement is very Paternalistic? Responding to Prof Petula Ho)。端傳媒。*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203-opinion-repost-choi-movement-patriarchy/> on July 3, 2020.
- 端傳媒評論組 (Unit of Commentary, Initium Media)。2020/02/28。〈光榮冰室事件，遇上了怎樣的溝通困境？〉“Guangrong bingshi shijian, yushang le zenyang de goutong kunjing” [What Kinds of Communication Aporia in the Glory Café Event?]. 端傳媒 *Duan chuanmei* [*Initium Media*]。Retrieved

from: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228-opinion-why-communication-not-work/> on July 3, 2020.

二、外文書目

- Arendt, Hannah. 1998.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ean, Jodi. 1996. *Solidarity of Strangers: Feminism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rrida, Jacques, translated by George Collins. 1997(1994). *Politics of Friendship (Politiques de l'amitié)*. London, New York: Verso.
- Fraser, Nancy and Axel Honneth, translated by Joel Golb, James Ingram and Christiane Wilke. 2003.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Umverteilung oder Anerkennung)*. London: Verso.
- Giugni, Marco and Maria T. Grasso. 2019. *Street Citizens: Protest Politics and Social Movement Activ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1985. *Hegemony and Social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 Pang, Laikwan. 2020. *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beyond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chmitt, Carl. 2007.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